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文革公安部长的离奇死亡	胡 平
【以史为鉴】	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	丁学良
【往事非烟】	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曹 培
【文献资料】	毛泽东年谱（1966年7月18日—8月20日）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文革公安部长的离奇死亡

• 胡 平 •

文革期间的最大悬案，莫过于公安部长李震的离奇死亡。

李震，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专业，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中共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调入公安部任副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故，由李震接任公安部长（那时候叫公安部革委会主任）。

1973年10月22日，在北京东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发现李震的尸体。地下管道很矮，不到一米五，死者衣履不整，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口中含有数十片未溶化的安眠药片，上衣口袋里还有剩下的一些安眠药。

关于李震之死，有多种文本，但有关现场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个自杀现场破绽百出，一望而知是伪造的。要吞药就吞药，要上吊就上吊，为什么既吞药又上吊？为什么大量的安眠药片不吞下去而要含在口中，还要剩下一些在口袋里？为什么上吊偏偏要选在一个站都站不直、吊更没法吊的地方？以李震的学识、阅历和职务，他拥有的自杀知识比一般人多得多，各种自杀工具（包括手枪、刀具、毒药等）都唾手可得。当时的李震并不曾受监控，以他的身份，他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李震如果真的要自杀，他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很专业的自杀。怎么会像现场呈现的那么乱七八糟？

起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李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大多数调查人员都认为李震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被塞进热力通道制造自杀假象。再说李震也没有自杀的动机。周恩来当时就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其后，中央成立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令人惊讶的是，历时5个月，调查组的结论竟

然是自杀。接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由于一些人反对，时任中共副主席的王洪文拒绝接受和批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没做成。我们知道，在当年，自杀通常都定性为敌我矛盾，其家属通常都要受到某种牵连。华国锋提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多少表明他对自杀的结论感到不安，至少是不希望影响到李震子女的前途。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这个有关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李震自杀时林彪已死亡两年有余，和林彪关系紧密的人都早就被审查、被打倒、被靠边站了，如果是他们供出了李震，李震早就该倒霉了，哪里还会拖两年？至于说和江青一伙的关系，就更不靠谱了，因为江青一伙在当时都红得很，起码是没人受审查被清算。就算李震追随谢富治，这在当时也不构成问题。从文革开始，谢富治一直都很红，72年3月病故，天安门还降半旗。有小道消息说谢富治临死前已经被审查，他不是病死的，而是畏罪自杀。这种说法和谢富治死后的高规格葬礼不相符。另外，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但凡当高官的老公被打倒，其老婆就立即成了“臭老婆”跟着倒霉。如果谢富治死后哪怕是在高层内部受审查或重新评价，那必然会影响到他老婆的命运。事实是，谢富治老婆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官运亨通，1973年当上卫生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的十大又当上中央委员，并且一直当下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才被撤职。既然在当时，谢富治仍被党国奉为正面人物，其追随者自然也不会政治上被审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而“畏罪自杀”自然无从谈起。

《公安史稿》对李震之死另有解释。《公安史稿》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林彪案已处理完结，李震能在1973年8月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和陈伯达就更没有关系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李震自杀是因为文革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李震承受不了压力，故而自杀。后来刘复之在接受采访时否定了这种说法。刘复之说，公安部确实有过“算旧账”的争论，但这场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而李震是1973年10月死的，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上述种种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原因的解释明显都站不住脚，这就更加说明所谓李震自杀一说站不住脚。官方的和民间的文革史家都对李震自杀一说表示怀疑。有人想查阅公安部档案，但不批准。李震的女儿李豆豆找过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找过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但后来也没有下文。由此可见，44年过去了，李震之死仍然是个谜，应是当局刻意保密，保密的原因估计是“为尊者讳”。

近些年来，一些相关人士发表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谈李震案件，由于这些文字都发表官媒上，因而看上去都是为当局的结论背书，但细读下来发现也未必尽然。其中有些说法反而加强人们的怀疑。例如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顾准的妹夫）写到，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另外也有人提到李震接到电话这件事。按说要查明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并不难，但是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却至今没有交代。

在我读到的文字中，下面这一篇尤其意味深长。

2005年5月31日《中国老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郝建生的文章“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1）。此文意味深长，值得细细解读。文章说，1973年10月初，担任过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红旗渠功臣杨贵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受到周恩来关注。接下来就发生了李震死亡之事，中央决定成立破案组。王洪文物色人选，周恩来亲自提名要杨贵参加。“受周总理委托，李先念副总理找杨贵谈话说：‘周总理听说你不愿到公安部工作，让我找你谈谈，还是去吧。调你到公安部工作是总理的意见，这是工作的需要，你可要理解总理的意思啊！’”破案组由吴忠任组长，杨贵具体负责。起初，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以“他杀”为主，杨贵“反复做思想工作”，把意见引导到“自杀”，再有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最后得出“自杀”的结论。

按照此文给出的脉络我们得知，周恩来亲自提名杨贵参加破案组，杨贵对“总理的意思”心领神会，由于杨贵“反复做思想工作”，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从“他杀”转向到“自杀”。如此说来，关于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暗中一手促成的。这和他公开场合下力主李震死于“他杀”的态度完全相反。假如我们不相信李震“自杀”说而倾向于“他杀”说，我们就不能不推测，周恩来和李震之死有密切关系，李震很可能是被周下令杀害的。

不错，上述文章还讲到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但破案组的现场观察离案发时间已经相隔了两个多月（这个破案组是1973年12月才完成组建，开始工作的），现场早已破坏，因此不足为据。早在10月22日，另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就组织技术人员到现场，做了三天调查，作出李震是“自杀”的结论。当时，刘湘屏等人不接受于桑的调查结论，并批评于桑“破坏了现场”。周恩来对于桑的态度看上去非常严厉，他在10月25日就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并且把于桑等参与调查的人统统隔离审查。然而这里的所谓隔离审查，客观上却是对于桑的保护。于桑没有关进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重要的是，在所谓隔离审查期间，“任何人不准提审于桑”（2）。于桑本来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个知情人，如果受审，扛不住压力，很可能会讲出什么。周恩来下令把于桑关在交通干校并不准任何人提审，实际上起到了封口的作用。这更表明周恩来和李震之死大有关联。

有文章说，李震因毁掉江青裸照被周恩来暗杀（3）。文章说，当年斯大林把一张江青在三十年代上海期间的裸体照片交给中共高层，周恩来要公安部长密存于公安部绝密档案。文革爆发后，江青探知此事，叫李震把照片交给她，李震不敢不从，江青把照片烧毁。周恩来得知后大怒，打电话责备李震，于是李震一去不回。

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可信。且不说是否真有这样一张裸照。问题是，江青利用权势销毁对她不利的相关物证这种事，都发生在文革前三年，那时候公检法被砸烂，公安部长谢富治又是她的亲信，做这种事比较容易，不会等到7年后由李震来做。再有，假如这事是真的，那么，周恩来获悉后很可能会生气，但是绝不会有杀掉李震的动机，相反，周恩来理当保护李震，以便为日后留下一个人证。

依我之见，李震之死和周恩来有关，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有关。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正是周恩来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沉重地打击造反派，大力恢复各级官员的权力。毛泽东虽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发动者，但是他并不想把造反派斩尽杀绝，他希望多少保留一些造反派的力量，以便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势力相抗衡。毛几次问：清查五一六是不是扩大化了？是不是没注意政策？李震是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副组长，主持大多数日常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报告。据说，李震曾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但都未采纳。1973年8月，中共举行十大，毛泽东一手提拔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并置于接班人的位置，一时间权势很大。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自然不积极，想来对周恩来一派的做法很不满，故而很可能想挖出一批材料，以证明周恩来一派妄图否定文革。李震身处清查五一六运动第一线，知道的内情最多，因此被周恩来灭口。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在讲到李震之死时，大都把它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叙事之中。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引用金春明对他讲的一段话。中共文革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五一六？为什么九大以后还要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还说：“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档案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由此可见，大家都感到，李震之死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关。只要你不相信李震是自杀而倾向于认为是他杀，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谁是谋杀者。在四十多年后当局仍然对这件事刻意保密，显然是为尊者讳。这个“尊者”不可能是毛，因为毛要封一个人的口用不着暗杀，毛可以直接让这个消失，直接把他送到秦城与世隔绝。毛对王、关、戚就是这么做的。排除了毛，这个“尊者”就只可能是周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实我们的猜测，但是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我们的猜测似乎是很合理的猜测。

注释：

（1）郝建生：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中国老人报，2005年5月31日。

链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31/12357213.html

（2）李海文：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2月16日。

链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16/c85037-23851428-4.html>

（3）公安部长死之谜：毁江青裸照引周恩来暗杀。

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2/3943203_print.html

□ 原载《民主中国》

~~~~~

【以史为鉴】

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

• 丁学良 •

整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籍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也就是自中共顶层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文革”结束的时候起，就不断地被中国人和外国人问起：它是否会再来一次？每逢“文革”发动和结束的五周年和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这样的问题总是会更加得到海内外学术圈乃至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深思（“维也纳大学著名汉学家S.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访谈录”，成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2月号）。

今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五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本身，就正在激发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投资界出现讨论的高潮。而如果人们联系到——怎么可能不联系到呢？——最近几年内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尚未结束的几桩重大事件和文化知识领域里的热点动向，“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个问题，便成为现实含义沉重得教你无法一笑置之的拷问。

诚实而言，回答“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类超复杂的严肃问题，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预言未来的。有句英语俗谚特别富有智慧：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领域里绝不可说“绝不”！）——政治领域里有太多太突然、太难预测的随机变化，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稳定透明的宪政体制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藉过去的历史经验，辅之以比较政治社会学的视野，勾画出“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几条边界线。它们有如地图上的路标，帮助我们判别“文革”式的政治巨变再发生的概率之大小。

在笔者根据亲身经验和研习绘出的“事态草图”上，至少有三条边界线最关键（其它较次要的边界线以后再补充说明）。它们堪作为警示性的红路标，如果中国今后的事态演化跨过了其中的一条边界线，对“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肯定式判断就将显著上升。当然事先须明言的是，这三条边界线的相对比重并非一模一样，它们的相互关系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解释。

#### ◇ 第一条边界线是社会管治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这么表述：如果中国大陆持续地、越来越多方面地压缩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这是一个醒目的路标，“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显著上升。

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之量和质的巨增，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员、信息、观念的跨越边界的形形色色互动，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内地本身和中国与全球文明社会之间发生的最醒目、意义最深广的正面变化之一。只要这些中外往来交流的大门大窗还开着，任何个人或组织试图再搞一次“文革”的筹划，无论多么精心刻意，就推展不下去。

五十年前毛泽东能够顺利发动“文革”，其根本保障之一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早已经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因此可以“关起门来打狗！”把门紧紧关起来是必要条件，不仅这使得门里边全面开展打狗的作业成本低，打死打伤了多少让外界难以知道、难以追究、难以救援，而且也使得被打的狗们无处可逃。

毛泽东早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前夕，就步步朝着把中国大陆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尽快关闭的彻底革命目标挺进，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有赖于此一必要条件了。毛于1949年初对斯大林秘密派到西柏坡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中国的屋子太脏了，“垃圾、尘土、跳蚤、臭虫”什么都有。解放后必须认真打扫这所屋子，然后再请客人进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1页；《毛泽

东年谱》，北京1993年版，第3卷第448页）。次年1月13日，毛就赶走美国官员、砍断中美正式关系一事通报苏联外长：“我们需要赢得时间来整顿国内秩序”。紧接着毛发电报给正在苏联会谈的刘少奇：美国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毛泽东文稿》，慕尼黑/维也纳1982年版，第1卷第241页；莫斯科AVPRF，卷宗3目录65，案卷364第97页）。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大陆不但隔绝于西方，也隔绝于苏联东欧，还隔绝于周边地区，蒙昧主义已成社会常态，全国犹如一个铁桶。若无这一完美条件，就无法对几千万的“黑五类”、“黑九类”分子发动持续不断的精神和肉体摧残。

拜改革开放之后续影响，当今的中国大陆每年出境旅游者有一亿多人次（去年1·2亿），入境来访者几千万人次；在海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年度统计达百万人以上（去年170万）；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通讯渠道多少都有一些。门窗开得这么大，实难再搞一次“文革”。即便有些人不能出境，有些人不能入境，有些人的护照被上交，有些互联网站被封，有时某个地区被断网，那也是定点定线的管控，至多是划块分片的管控，与“文革”前夕的完整铁桶体制相比，是天差地别。

#### ◇ 第二条边界线是经济体制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如此表述：如果中国大陆经济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少连接串通、相互依存度大幅降低，“文革”再来一次的概率就大幅上升。

这条边界线作为路标虽然不像上述第一条那么醒目，但也是可以用长时段数据客观测算的。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从1950年代初开始，快速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接；从1950年代末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体系。官方宣传说它是“自力更生、自给自给”，实际上它是倒退至半奴隶制的准战时经济模式，与现在的朝鲜体制属于同一家族。这样的模式虽然令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却经得起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折腾，因为你怎么折腾，也不怕外资逃亡、外贸崩塌、本国货币兑换率狂泻、外币存储枯竭等等。

而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深深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名列前两位的吸引外资国、快速上升的国际金融运行国、高新技术循环大国，等等。所有这些与国际经济体的活生生串联，都是中国党政军体系的输血大动脉，它们一旦被折腾得萎缩干枯，那就是国民经济沉船的前兆。警铃响几下，船长、大副、二副们就得抢险：船要是给折腾沉了，他们也就当不成船老板了。被称为“小文革”的1982—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发作了几个月就停机熄火，原因就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开放改革。实际上，它的打击重点是文化知识界，属于上述社会管控领域，可是迫使它下马的却是经济的动因。所以，一个持续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是中国抵御“文革”再来一次的主力军。

#### ◇ 第三条边界线是权力运作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划分的参照点是毛泽东倾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大手笔，可以这么表述：假如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武装力量为直接手段、对数量众多的高层文职官员进行规模清洗的事态，那么，“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急剧上升。

此处要害是“武装力量 vs 高层文官”这个对子。中共虽然主要靠着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但1949年以后的长时段里，毛泽东治理中国最核心的规则之一，是防止军人随意干政。毛在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期两度重用邓小平，主要因素之一也是邓坚持贯彻这一规则。因此可以这么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权力架构的正常状态是文官主政（参阅比较研究共产党体制的名著对此的解释：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5-48。作者特别驳斥以“军事专制”来界定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突然出现动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核心警力——来对付高层文官，而且不是针对几个，是针对批量众多的高层文官，那么，其含义是极具震撼性的。它表明，在党政高层已经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重组的规则，来达到人事或政策的重大变更，这样的目标受到高层文官多数的反对，于是只好动用武力。

这恰恰是1966年出现的状态——毛泽东在许诺拉拢了林彪集团，同时对首都的军警要害单位作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构调整、人员挪动、指挥链变更之后，对刘少奇为首的大批高级文官发动了连续清洗（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286—362页）。严格说来，毛泽东的这种权力运作并不能和一般界定的军事政变划等号，因为后者通常是一帮职业军官秘密勾结以武力推翻其顶层上司，而毛本人就是文（党主席）武（军委主席）顶层一把手。所以，这只能从破坏党政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的角度去解释：毛泽东无法走正当程序改变大政策和高层人事结构，只好以游击战手法先破局再设局（李逊：《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章）。1977年后邓小平那一代高层多次提及此一教训，念念不忘。

◇ 小结：要素和整体

五十年后的今天，无数中国人和海外观察者还在疑问：“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种担忧确有部分根据，1982—1983年的“清污”运动、2008—2012年的“唱红打黑”运动，是曾经发生的最醒目的类似“文革”实例。不过从以上的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有把握地说，1976年后虽然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在有的方面或有的地区，发生过“文革”某些要素的回潮，但“文革”整体并没有再来，上文列举的三个警示红路标没有相继亮灯。

展望未来的十至十五年，“文革”要素回潮仍然会发生并造成个人的或局部的悲剧，但“文革”整体再来却极不可能，因为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在摆脱“文革”发动的必要条件之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已经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多重利益结构，使形形色色得益者们不愿或不敢砸碎脚下的大船。即便有些人或帮派做梦再搞一次“文革”，那是虚张声势、力不从心。诸位若是不信，可回顾薄熙来一伙在官场的后20年。

小结：最近一两年来海外无数“文革又回来了！”的洋文中文言论，是惊弓之鸟的高音鸣放，值得我们警惕，但不能够据此来展望中国的大走势。

□ 原载《FT中文网》2016年5月9日

~~~~~  
【往事非烟】

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 曹 培 •

1966年我是北京101中学初一的学生。父亲当时是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母亲是京工附中（现理工附中）的教师。他们都是非常本分敬业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与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也非常平凡，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仅以我个人的有限视野和记忆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够充实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

一，血统论与“对联”流行的岁月

1966年的6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教数学的C老师写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的分解因式题让我们做。部分已经做完的同学已经在看其他的书了，我却因昨晚熄灯后与小闺蜜在被窝里偷吃橄榄而头脑有点昏昏沉沉，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和焦躁不安，突然校园里传来一阵嘈杂声。一开始大家都没有介意，后来这嘈杂声越来越大，大家才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去看究竟。运动来了，停课了！一下子平时的学习纪律全部被打乱了。听着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革命口号，看着校园里一夜之间贴满的大字报。糊里糊涂地跟着参加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懵懵懂懂地跟着举拳头喊口号，心中却有一点为不用继续去攻克那道数学难题而窃喜。我并不知道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学习数学了。也不知道这运动将与我自己的家庭会有什么关系。

1、不成文的“身份法”

学校里迅速成立了“红卫兵”，全部由清一色的“红五类”子女组成。学生们根据家庭出身被严格区分为三大类。第一为“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是革命的依靠力量。第二，非“红五类”，包括职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这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职业而划分的。当时“职员”是个非常大的范畴，包括机关职员、医生、小知识分子、公司员工等。凡够不上“高知”，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便统统归入“职员”。例如我父母解放前是中学教员，我的出身便是“职员”。第三，“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后来又加上了资本家和走资派，是为黑七类）子女。则是革命所要防范和“改造”的力量。这种划分是参照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方法。虽然并无法律法规，甚至也没有什么权威性文件可以依据。

在“红五类”中，地位最高的是革命干部子女（简称革干），其次是才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革干子弟的身份是由其父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定的，界限是必须在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前。在此之后入党的就不算了。记得我校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曾开除了一位学生，原因是查出其父的入党时间是1946年。革干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又是“高干”子女，即父亲的官阶在行政13级以上。在红卫兵里能够耀武扬威的都至少属于这一类家庭背景，知名领导干部的子女往往自然就成为红卫兵的领袖。在同级的干部中，军队干部子女又比地方干部子女优越。因为当时很多政府部门和地方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全国处于“军管”状态。军人在文革中不仅地位和权力急速上升，还被树立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榜样。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被奉为圭臬贴满了校园。实际上歧视和打击蔓延到对所有的非“红五类”子女。

“职员”出身的我比起班里的“红五类”来自觉矮了一截。当时看到班里那些干部子弟穿着军装带着红袖章，威风凛凛地出入校园，令我羡慕不已。特别是那带点腰身的女式军装，再配上腰带，在当时就是最美的少女时装了，那是一种“飒爽英姿”的美，除此而外，其他的美都是被批判的。刚满14岁的我自然也想赶赶“潮流”，就回家问妈妈“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呢？”妈妈说：“哎呀，我们当时在四川重庆，哪里知道什么革命，身边也没有共产党啊。”我深感失望。唉，谁叫自己生错了人家和地方呢？于是我迷惘地继续上学，别无选择地追随着众人参加各种批斗会，跟着举拳头喊口号。看到昔日我所尊敬的老师、校长被批判、斗争、强迫劳动，心里总是感到别扭。特别是看到有人抡着皮带抽打跪在地上的老师，就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不敢看。随即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你同情牛鬼蛇神，是因为你天生就有阶级立场问题！”又不敢不看。班里原来的几个好朋友也因为我出身不是“红五类”而不理我了，我只好与一名出身“高知”的女孩形影不离。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返回学校。快走到传达室的时候，猛然看到道路被几条板凳拦住了。等走近才看到板凳的两端留出了两个出口，各贴了两张大字条。一条写着：“工农革干子弟门”，另一条写着“资产阶级狗崽子门”。门口有几个穿着军装的红卫兵正守在那里。我当时感到自己的脸刷地变白了，一时不知自己该走向何方。我的出身是“职员”，但没有第三个门。难道非红五类出身的就都是“狗崽子”？可当时哪里有论理处？只有继续向前走。眼看那“鬼门关”越来越近了，没有发现认识我的同学，于是把心一横就加快脚步朝着“工农革干子弟门”走去。突然前面一位穿着小花短裙的女孩回过头看着我，天哪，是我们班里革命干部出身的 ZH，还曾和我在同一个运动队里训练过。假如她当众揭发我就完了。在那个时候“冒充工农革干子弟”可是罪莫大焉。我肯定会被人揪住当众批斗羞辱一番，如果再被“上纲上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此时我已没有退路，只能低头快步穿过那工农革干子弟门，感觉那一瞬间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还好，ZH 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走过去，什么表示也没有。我快步回到宿舍后惊悚未定，当晚都没有敢去食堂吃晚饭，生怕在大庭广众之下再被人指认出“假冒工农革干子弟”。这件事令我对 ZH 一直心怀感激。虽然她与我后来成为对立派，我心里始终都相信她是个“好心人”。事后我听说有同学真的走了那狗崽子门。甚至有人从板凳底下钻了过去，以自甘其辱来表示“重新做人”的决心。

2、班级斗争会

8月3日，我们班里的“红卫兵”突然通知我晚上到教室开会。会议一开场，主持人 L 某就带领大家学习了一段语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形容蠢人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是这样一些蠢人。”读后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们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了打咱们班‘狗崽子’的气焰的！现在班里的‘狗崽子’气焰太嚣张了！”当时我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我们是六五年入学的。由于当时已经贯彻了“阶级路线”，所以我所在的初一五班的同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红五类”出身。非红五类中也并没有“黑五类”，职员和高知就是最坏的出身了。女生中只有我和 W 两个人是非“红五类”出身。W 的父亲是一位国宝级的大教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男生中非“红五类”的也只有两三个人，我们在众多的“红五类”子女中显得很孤立。

主持人先令一位男生 X 站起来“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X 说自己的父亲是铁路职员，主持人就指责他“不老实”。说“据我们调查”你爸应该是右派，你就是狗崽子云云。X 试图申辩，立即就会有人高喊：“右派的狗崽子你别狂！”就这样非红五类子女一个一个地过关。最后轮到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就遭到了围攻。我一边抹眼泪一边为自己申辩。“我爸爸不是黑五类，我就不是狗崽子！”“你爸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打倒！”“我是职员出身！”你对抗革命就是狗崽子！”“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我们革命群众这样说了！”“谁敢对抗革命群众就是反革命！”大家先是坐着开会，然后来就全站起来，我也被命令站起来。许多其他班级的同学也来参加了。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在当中。前面的人站着，后排的站到椅子上，最后的站到桌子上，如泰山压顶之势。一位不久前还与我在熄灯后偷吃橄榄的闺蜜，这时手叉腰脚蹬椅子恶狠狠地说：“今天就他妈的杀鸡给猴看！”最后大家给我让出了两条路，一条是脱胎换骨自我改造的“革命”道路，另一条是对抗革命群众的“反动”道路。强迫我拍手念“对联”。我念过后，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最后的抗议：“我认为你们这样做不对！是打击一大片！”然后就哭着从那条所谓“革命”的通道跑了出去。背后还听到教室里在集体大声念“对联”。

当时很多班级都对非红五类的同学进行了围攻斗争甚至殴打。有些班级比我们闹得更厉害。初一六班非“红五类”的女生比较多，她们集中住在一个房间里。这天女孩子们正乖乖

地在各自床铺上学毛选（这是当时唯一可以读的书），门猛地被踢开了，班里的一位高干子女Z威风凛凛地站在门前，手里拿着一摞出身非“红五类”的女生的照片，每张上面被打叉了，写了辱骂的话语，如“臭流氓”、“四眼狗”、“大冬瓜”等。她把照片猛地甩到地上，连连擦着手说：“臭死了！臭死了！”她身后站着一群班里的干部子女，声称要来造“资产阶级狗崽子的反”。她们在宿舍门口贴上了“对联”，还用尽了侮辱的语言谩骂同学。原来她们从班主任那里拿走了所有同学交的照片和家访的记录，就借此羞辱和谩骂同学。一位同学M忍无可忍，回击到“你们那对联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最高指示。”Z就说：“有種的你過來撕了？”“撕了又怎樣？”“你撕啊，諒你也不敢！”M一氣之下就冲到门口，刷刷几把就把那对联撕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一时楼道里挤满了人，其他班的干部子女也来声援，一起声色厉俱地把室内的几个女孩子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们还配戴红领巾呐，摘下来！”“你们也配带毛主席像章？”最后勒令几个顶嘴的女孩子写检查，要她们不仅要在门口重新贴好对联，还要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床头贴上一幅小对联，下午就要来检查。谁敢不写不贴就要“砸烂谁的狗头”。说完就挥着皮带威风凛凛地走了。女孩子无奈只好去买纸买墨写对联，在门口重新写了一副大的，每人在每个床头又贴上了一幅小的。其中上联“老子革命儿好汉”用红色纸，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用粉色纸。下午Z带着红卫兵们又威风凛凛地来了。她们逐一检察了贴在墙上的对联，并把两个女孩们写的“检查”收去边看边读。随后斥责她们“假检查，真反扑”，再次把她们狠很地批斗了一顿。

八月十八日那天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早六点学校广播站就通知了，让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清早起床乘车，而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一律不准去。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赶去接受检阅。而我们只能坐在宿舍里，听着广播里反复有人吼叫着：“请各班仔细检查自己的队伍，把混在里面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揪出来！”一阵喧闹之后，卡车队终于开走了，学校安静了下来。我们几名出身“非红五类”的孩子沉默地坐在宿舍门前的台阶上。后来不知谁起头，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有人唱得落下了眼泪。当晚我们加了红五类子女回来后在大饭厅举行的庆祝会，当然是站在最后排。庆祝会的主持人带领大家一齐拍手朗诵“对联”时，声明是只有“红五类”出身的才准念。这时会场上一片疯狂的声音“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一見一愁！”，最后三个字是拉着长腔吼出来的，既有幼稚的霸气，又带着热腾腾火药味。此时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们皆不敢出声，只能以随着节奏拍着手，以表示对“红五类”的恭顺与臣服。

即使在“血统论”最盛行的时候，校园里仍有少数学生敢于批评对联和血统论。例如李建功、胡生、赵秦胜、叶惠中、陈因硕……。尽管他们当时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批评只是从政策角度。毕竟在那个愚昧闭塞的年代里，能够有独立的思考和反潮流的勇气，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运动转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批资”），其中包括批判“反动血统论”和“反动对联”。

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可以组成战斗队，带上红袖章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当时我们初一五、六班的十几个女孩子成立了“红色接班人”战斗小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为了声明我们从小受的也是革命教育，我们也是红色的）大家选我当组长。我们立即参加了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随即有组织地写大字报和开会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分头撰稿，集中抄写张贴。大字报贴出后得到了不少高年级同学的支持和同情。这时班里的几名原“老兵”前来与我们交流谈心，我们立即恢复了友谊并成为亲密战友。“批资”运动使我对毛主席充满感激，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是革命的，

起码是要革命的。谁敢压制我便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您的革命路线，我现在哪儿抬得起头来？我一定珍惜您老人家给我的革命权利，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最最忠实的红小兵！”

在当时的一片“造反”“革命”的呼声中，自己心里也躁动着，想尝试一下“造反”的感觉。有一次和几位同学在校园里转着看大字报时，突然看到我们班的两位曾被批评过的老师们正在一间办公室里写大字报。刚下过雨地上有些积水。于是几个孩子就用手捧起水来撒向那纱窗。水通过纱窗撒在了老师们的身上和桌子上。S老师出来抗议说：“你们把水洒在大字报上了，影响别人革命。”我们说：“你们也想革命吗？”就嘻嘻哈哈地一哄而逃了。那感觉像阿Q终于摸了小尼姑的头。其实当时自己也不到十五岁，正是叛逆的年龄。文革初期只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可以以虐待老师校长来满足这种叛逆心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则一直被压抑着。直到“批资”后个人地位变化终于给自己带来了发泄的机会。不过没过多久就开始军训和复课，“造反”降了温，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恶作剧行为是错误的。几经犹豫，终于走到S老师面前说想和她谈谈。她热情地说“好啊！”。我们绕着大操场散步，我嗫嚅着讲出了那件错事，并检讨了自己的当时的“私心杂念”。S老师爽朗地说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赞扬我“斗私批修”思想有了“飞跃”，感动得我落了泪。

1967年春季中央文革的首长分别在四月三日和四日接见了学生领袖，中学生随即分裂成四三、四四派。（1）101中的四三派组织是“毛泽东主义公社”（简称“公社”，与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针锋相对，经常在校园里开展辩论。我们班的四三派成立了“五敢”红卫兵，是“公社”的一支铁杆力量。与我们的对立的是“老兵”在本班的支队，叫做“代代红”借以标榜他们的革命血统。在对待老师和校长的态度上，“公社”的观点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对当时的副校长文方。我记得我还与文方座谈过，还在辩论会上为文方辩护。我们不认为文方是走资派。认为他是可以结合的好干部。这一点与“军训团”和“四四”派有分歧。他们是要坚决打倒文方的。文方在文革后又做了校长，还担任过海淀区教育局局长。

不同派别的学生经常在校园展开激烈的辩论。虽然“血统论”的高峰已过，在辩论时先质问出身仍不失为一个“杀手锏”。毕竟“职员”、“高知”不能作为响亮的回答，有时还会遭到奚落“小职员儿现在还挺狂的啊！”所以每当“老兵”们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什么出身？”时，我们这派的干部子女立即挺身而出把我挡在身后。后来有些“老兵”的父母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冲击。其中一名女孩子在辩论中当被人问及父亲的问题时，异常激愤地反问对方：“好哇，你们是不是希望我们干部子弟的家庭都有问题？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随即大哭。

1968年前后，16岁的我们开始上山下乡或当兵当工人，对立派的同学从此不相往来。

4、重逢与反思

2005年101中学60周年校庆，已经年过半百的同学们在圆明园欣喜重逢。大家一起吃饭时，我对一位曾经的“老兵”X说：“记得吗？咱俩在宿舍里床挨着床，还合盖过一条被子呢。”没想到她听了只是一个劲地猛喝酒，然后突然大哭起来，一边对我说：“我对不起你！咱们小时候那么好。咱俩还盖过一条被子。在文革中我不该斗你呀！”我忙说“得啦，快别提了，都这么多年啦。再说当时大家都是受害者……。”她依然大哭不止，说什么都不劝住。这时又有一位前“老兵”Z诚恳地对我说：“其实不光是她，我也一直觉得对你们歉疚。我跟你吵过，骂过你。”

事后又有同学发邮件给我表示了歉意。我才知道原来她们三十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负担。而作为“受害者”的我反倒早就没有怨恨了。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倘若自己也是个革命干部子女，我也会去吹捧“对联”（何况自己也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错误，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愚昧与荒诞。“快放下这负担，开开心心地过晚年吧！”我对同学说。2012年春，原初一五、六班的同学终于重聚一堂，并请来了S、C等老师们，集体庆祝了我们的六十岁生日。至此“老三届”中的“小屁孩儿”全部步入老年。

往事并不如烟。尽管一切个人的是非恩怨都可以放下，对于文革历史的质疑和探究却不该停止。最近读了一些资料，方知“血统论”与“对联”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自1963年以后毛泽东提倡的“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其副产品。所谓“阶级路线”就是将青年根据家庭出身被分为三六九等，作为被人事部门和招生、招工单位内部掌控的“身份法”。从那时起绝大多数的“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就被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到66年文革中“阶级路线”发展到冲击国旗中的两颗星，即把“工农商学兵”中的商人与学者剔除，只有“工农兵”才是社会主流。在其他中学发生了殴打、游斗示众“狗崽子”的情况。于此同时在学校里揪斗校长老师，社会上在查抄“黑五类”的家，不少人被殴打致死。最甚者是北京郊区的大兴、昌平竟把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满门抄斩。相比之下101中学在“红八月”中真算是很“温和”的了，我个人的经历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有些后怕。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当时这种疯狂野蛮恐怖的气氛，其实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制造出来的，他曾批评阻止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试图采取措施制止武斗中打死人的建议，故意制造了社会治安的真空。同时中央文革首长们到处讲话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令使他们头脑膨胀。这就造成了满城的“红色恐怖”。一大批“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被推到毫无治安保护的状态，任那些一时被妖魔化了的青少年殴打和宰割。毛泽东在当时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不知道后果。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而不惜抛弃千万无辜的生命。

（2）几个月后，中央文革领导了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运动，又把血统论和“对联”栽到刘少奇和中学生中的“联动分子”身上。例如江青、关锋等先在七月份接见红卫兵时表示支持“对联”，却又在几个月后的“批资”大会上指责“老兵”们“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原来大家都被蒙蔽、利用和抛弃了！有些人先被发动利用，然后被抛弃整肃。另有人先被排斥整肃，然后又被发动利用。到最后几乎人人被骗，个个受害。整个文革中曾有几亿中国人被卷进这场“人整人”的荒诞残酷游戏中，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被欺哄、利用和毒害。当时的领导者放大并利用了他们身上的顽劣残酷，扭曲泯灭了他们原本的人性，给他们造成了长久乃至终身的创伤和悔恨。

二，“清队运动”——父亲的遭遇

文革中的另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由毛主席公开“亲自发动”的。那时毛主席经常发表“最新指示”，通常是在晚间播放出来，于是人们就马上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喊口号，叫做：“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记得是1967年夏的一个夜晚，我们已经休息了。突然听到校园里一阵喧嚣，起床一问原来是毛突然发出了这样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于是同学老师起来游行，在校园周边转了一大圈，喊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

岁！”等口号，一直游行到后半夜才睡觉。谁也没想到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向年长的人们张开了巨网。

周五晚上，我忽然感到心神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和悲伤。第二天我惶惶不安地从学校回到京工校园里的家时，发现家里已经乱作一团。表姐告诉我昨天学生造反派组织来抄家，把爸爸带走了，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爸爸昨晚一夜没回家，把妈妈急得到处找人问该怎么办。一位好心的老革命伯伯告诉她，“你不能不找，一定要去找。就去找军训团让他们管。不然叫这群学生把人打死了都没人管。”

当时大学里都进驻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训团）来领导文化革命。妈妈急忙连夜去找，可是领导们已经下班，只留下值班的小兵不管事。妈妈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又急忙去找到军训团的领导。那领导说这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只能支持。接着背诵了“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条毛主席语录。这时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工红旗”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在露天剧场揪斗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妈妈听了反倒松了口气，这至少说明爸爸还活着。

我向露天剧场跑去，一路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许多老教授、老干部被揪了出来。原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造反派红卫兵立即接管了大学的人事档案。年轻学生把凡是有“历史问题”记录的人全部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争。爸爸被画了漫画，名字被打上了红叉。我跑到会场，听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被点名，反剪手押上台坐“喷气式”。当念到“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时，父亲被押上台，到台中间被人揪住头发亮一下相，头就被深深地压下去了。当时我只觉得头嗡地一声，几乎站不住了，就靠在身后的一根电杆上。听着人们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如万箭穿心，看到一片森林般的愤怒拳头仿佛都向我打来，只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爸是历史反革命？我是“黑五类”？天哪，今后我该怎么办？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问妈妈：“爸爸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妈妈冷静地说：“你爸爸不是反革命。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从没听他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从没见过他办过一件反革命的事。一定是搞错了。”妈妈说，爸爸1946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曾经到当地“三青团”机关工作过几个月。但是父亲是个政治独立人士，一直在组织上没有加入三青团。几个月后因谋得一个中学教师职位，就离开了这个机关。这个“历史问题”爸爸在参加工作后曾多次向组织交代过，也早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在档案里写的清楚明白的。

妈妈虽然身体羸弱多病，在暴风雨面前却是非常的清醒和镇定。“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爸爸的问题将来一定会查清楚。”妈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于是我和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地期待着未来。爸爸被集中住在“牛棚”里。每天在校园里拔草、扫马路、烧锅炉。背后缝着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名字上还被画了红叉。我曾去给爸爸的“牛棚”送过东西。那是在一间大教室，水泥地上铺着些稻草。”牛鬼蛇神”们——很多是我认识的伯伯叔叔——依次把被褥铺在稻草上。他们的背后全缝着大白布，个个垂着头回避着所有人的目光。

当时我家里住着从四川南充来的两位表姐，她们是由舅舅舅妈送到我家来躲避四川的武斗的。舅舅已经寄来路费让她们回去。这钱在造反派抄家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走了。表姐们没钱回家了，我家又不适合长住，妈妈只好四下借钱给她们凑路费。表姐们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了这件事，当时十五岁的我脑门一热，就和两个表姐一起去找造反派要他们把路费还给表姐们。我的幼稚冲动闯下了大祸。造反派硬说我们是来“反攻倒算”的，用梭镖抵着我们的胸口把我们赶走了。然后把父亲从家里叫去毒打了一顿。父亲回来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背上还有个脚印。这个情形令我又怕又悔恨，一个人躲到阳台上哭，甚至连跳下去的心

都有了。妈妈先和蔼地安慰着爸爸，给爸爸扫去身上的尘土和背后的脚印。又到阳台上安慰我说：“小培，你看到别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急得直哭吗？别急，早晚党会给爸爸落实政策的。”妈妈一句都没有埋怨我。

事后我才知道，爸爸被他们关在一间教室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派踩在爸爸身上，一定要他承认是唆使子女反攻倒算。父亲被踩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呵呵声。幸好隔壁有几个女同学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她们过来劝了几句爸爸才被放开。我做的这件傻事竟差点要了老爸的命，每次想起来都会感到对父亲的无限愧疚。

年仅十岁的小弟在小学被拒绝参加“红小兵”。一脸委屈地问我：“姐姐，咱们不是自来红，那我们是什么？是自来粉？还是自来白？”我不知如何回答。小学停课了。他无事可做就与另一个小朋友去逛新华书店，突然有一个成人手里拿着一本红旗杂志社论的单行本，一把揪住弟弟的脖领子吼道“偷书了！”立即有一群人围攻小弟。质问他是什么出身，骂他是“小偷”、“小流氓”，非要逼着他承认自己偷了那小册子。吓得小弟除了抹眼泪什么也说不出来。另外一个小朋友见状赶快跑回家去叫妈妈。妈妈赶来看了一眼那“赃物”，漫不经心地说：“家里这种书多了，他根本就不看！”拉着小弟就回家了。后来妈妈再也没提过这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已经去世的母亲黄孝恂。虽然她当时作为中学二级教师和“北京市劳动模范”所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她从未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惊慌、恐惧和烦恼，反而总是以一贯的淡定从容、温和乐观的态度宽慰着大人孩子。有一次蓬头垢面的爸爸从劳改队暂时回家，在那个年月里他的眉头总是皱着，头总是低着。妈妈一面轻轻地用手拂去爸爸肩上的尘土，一面温柔地讲着安慰的话。她那从容不迫的微笑和若无其事的语调我至今记忆犹新。文革中曾有许多家庭因政治压力而破碎，我们全家能够安然度过那场灾难，都亏得我们有一位善良无私、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作靠山。

遵照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牛棚”里的人们立即成为教学骨干。他们不仅毫无怨艾、而且还感激涕零，拼命工作。他们当时只能使用前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而且大部分时间还要参加体力劳动和带学生下厂实习。爸爸搞化学成瘾，一边继续烧着锅炉，一边研究着锅炉去碱问题。有空就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所幸在那里还可以看到国外出版的英文书籍，据说当时全国仅此一处。爸爸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当时国内使用的教材已经比国外落后了不知多少年，许多新的科研成果他都不知道。直到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外的教材才被翻译使用。作为当时少数精通英文又年富力强的教师，爸爸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他开讲“无机化学”课程时，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挤满了饥渴的学生，连地板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由于没有麦克风，爸爸讲课像是大喊大叫。妈妈说他那是在“过瘾”。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组成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运动”冲击了不同的人群，至今留下了许多诡异迷离的历史谜团和难以忘怀的创伤悲剧。我一直不明白毛主席发动那场“清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有“剥削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要翻天。何况当时被整的人们后来百分之百地都被平反了。这场把人折腾的死去活来的运动目的究竟何在呢？后来看了些资料，方知有一种政治手段叫做“制造敌人”。也就是领导者通过制造“假想敌”以达到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制造专政的理由和动员国民响应和服从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既“造神”又“造敌”的运动。“造神”与“造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至于多少无辜人民被冤枉成敌，惨遭迫害，当时的领导者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如今来看，我家还算是很侥幸的。虽然在文革中大人孩子都受过伤害，毕竟都平安地活了下来。有很多人家破人亡，很多孩子被刺激得精神出了问题。我有个写得一手漂亮字的15岁的表哥，由于目睹了他的父母（即我的亲姑父与姑姑，当时是某厂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在文革被揪斗游街殴打而患上精神分裂症，至今仍生活在精神病院里。我家楼下有个人见人爱的六岁男孩小驹子，在文革中曾被父母送回老家避乱。不想他被人从奶奶的怀抱中强拉出来后，又亲眼见了奶奶作为地主婆被乡里人游斗殴打，从此就患上了痴呆症，以至于后来不能上学成了废人，至今晃着一米八的大个子在校园里徘徊，人们只能投去惋惜的目光。类似这样的惨事在无数家庭与亲友之间发生过。至于那些死于非命的亡灵、家破人亡的悲剧则多达几百万。

忆昔抚今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分明是成人之间的斗争为什么要利用未成年人（红卫兵）呢？分明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株连平民呢？无论当时领导人的政治意图是什么，说到底这反映出在一个没有宪政、没有法治的社会中个人操权的任意与无节制，权力更迭的无规则与残暴，以及人民生命和尊严的无保障，这是不该被淹没的历史事实。而一个社会在牢固地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制度之前，这种潜在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都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注释：

- （1）关于中央首长在1967年四月三日和四日接见学生领袖的详情请参看胡生的文章
（2）参见孙言诚：“血统论与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 原载《共识网》

~~~~~

#### 【文献资料】

毛泽东年谱（1966年7月18日—8月20日）

△ 7月18日一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 7月19日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同日一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7月21日一审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2）（七月十六日草稿），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3）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毛泽东的主要修改是：（一）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二）将其中一条的小标题“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三）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

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此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又作了多次审阅修改。

（2）这个文件在1966年7月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3）指文件起草小组。

△ 7月2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1）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1）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

△ 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学术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取消，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 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的问题，一个斗，或者叫批判，一个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同日—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1），批示：“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1）这个电讯稿的第5页上说周扬“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



△ 7月26日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 7月29日一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 7月31日一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2〕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1〕：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1〕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

〔2〕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7月28日将这两张大字报送给江青，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8月1日—2日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 8月1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刘少奇向会议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会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后约王光美、蒯大富〔1〕谈话。次日晨，周恩来又先后约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叶林和蒯大富等谈话，着手处理该校的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同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中引述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社论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

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1〕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后来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 8月3日下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

同日一晚九时，阅陈伯达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后批示：“伯达同志：改得很好，可即印发。”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

△ 8月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插话中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同日一阅陶铸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以上意见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请中央考虑决定。毛泽东批示：“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本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陶铸的报告。

△ 8月5日一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1〕上批写一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一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写了一个批注：“危害

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日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曾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1〕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登载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转载了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2〕这张大字报标题中所说的“司令部”，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一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8月5日、9日、11日三次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五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1〕”。他还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九日审阅时，加写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删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的“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九个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后面，加写：“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有些修改，请酌定。其他都同意。”十一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可照此印发。”这个公报于八月十二日经全会通过，八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援越抗美的声明。

△ 8月6日一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同日一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 8月7日一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同日一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

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断改造”世界观和作风，毛泽东将“不断改造”改为“逐步改造”。

△ 8月8日一上午十一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二、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三、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五、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干部大致可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十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十二、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八月九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一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 8月10日晚七时十五分，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8月11日、12日一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

△ 8月12日一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在闭幕会上

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 8月13日—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 8月15日—阅陈伯达八月十三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

同日一晚上，阅陈伯达、康生本日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毛泽东批示：“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华北局需要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 8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 8月17日—应聂元梓请求，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刊名“新北大”。

△ 8月18日—晨五时，身着军装到天安门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

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陈云进行简短交谈。还同萧劲光、苏振华（1）、李作鹏等人握手、交谈，要他们团结起来，并对李作鹏等人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同薄一波握手时勉励他好好革命。整个活动持续六多个小时。期间，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群众队伍中同周围的人握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苏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提法。此前，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讲话中提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的统帅指挥下”。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